

敦煌汉简书法精选

莫高窟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马建华 赵吴成 编

敦煌汉简书法精选

炳午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云石
书名题签：刘炳午
装帧设计：沈仁

敦煌汉简书法精选

编者：马建华 赵吴成

出版者：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兰州第一新村八一号)

印刷者：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八五〇×一一六八厘米×
十六分之一

印张：六

第一版 一九九五年十月

第一次印刷 一九九五年十月

ISBN 7-80588-116-2/J·101

定价：四十八元

序言

敦煌汉简的发现是在本世纪初，由英籍探险家、考古学家、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其一九〇七年第二次中亚探险考察和一九一五年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中发现的。他先是在敦煌的西北部发现了汉代的边塞烽燧，并沿着边塞烽燧的走向溯疏勒河向东追寻，找到了著名的中国汉代长城。并在这些汉塞烽燧遗址中，发掘获得了七百枚汉代的竹木简牍。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王国维先生，根据他见到的这批简牍的部分照片，做了翔实的考证，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

到了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组的夏鼐、阎文儒先生，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附近，再次发现了部分汉代简牍，并考证出小方盘即汉代的玉门关。从此以后人们常将疏勒河下游汉代长城沿线的汉代简牍通称为敦煌汉简。

近年来，随着祖国文化的复兴，文化与文物考古事业越来越被重视，文物考古成果层出不穷。一九七九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时，在小方盘西十一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遗漏的一座烽燧。经省文物考古所的科学发展，获得了千余枚汉代简牍。在一九八七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其市全境的文物普查中，不仅在疏勒河沿岸的汉代长城边塞烽燧采集到了百余枚汉简，还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处的三危山麓下，发现了汉代效谷县的县泉置遗址。该遗址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三年，历时三年的发掘，清理出了驿置的建筑遗址，并获得了数万枚汉代简牍。

以上介绍的敦煌汉代简牍，除了县泉置出土的简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紧张的整理、释文外，其他的简牍照片和释文，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已汇总在《敦煌汉简》(中华书局出版)一书中。

甘肃是汉代简牍的蕴藏宝库，除以上介绍的，在黑河流域沿岸，武威、甘谷，均有汉简发现。甘肃境内的汉代简牍，据现在的考古发现研究，从出土的遗迹类别不同，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在汉代为拓边和守边，在其军事防御线——汉塞(现称长城)及其系统的坞障、烽燧遗址出土的那些汉简。是戍边吏卒在戍戍时纪录下来的各种文书。这类遗址出土的简牍，时间延续长。汉塞的军事机构维持了多久，这地方的汉简形成时间就会延续多长。汉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主要是围

绕守御边塞事务，与汉王朝的军事拓边、边境管理和西域用兵事件紧密相关。有向下传达而抄录的诏书、律令、品约，向上呈报的奏章、公文；有起草的文书底稿，戍边士吏的家书以及学习用的习字帖等。因而汉代边塞沿线烽燧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书写者多，文化修养层次不一，书法字体丰富多变。有的明显是初学者，照简摹帖，写的字体虽然工整，但用笔艰涩。有的工整健美，一笔一划，一落一起都极规范有章法。还有一些是狂放不羁，整条简牍的文字是一挥而就，如高山流水，极其自然流畅。在甘肃境内的敦煌汉简和黑河流域下游地区汉代时期居延都尉辖区的边塞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均属这类型。

第二种是在汉代墓葬中发现的简牍文书。它们的内容常是和墓主人有某种联系，墓主人认为值得珍藏的一些诏书、律令、史书、文书以及药方等。这类简牍常是精心抄录，不仅文字工整，书写人一般都有较为深厚的功底。这类简牍，在甘肃省境内主要在武威^①、甘谷^②有发现。

在编排《敦煌汉简书法精选》时，为了表现汉简的以上特点，在正文中选择的是能表现敦煌汉简书法特点的简牍照片。以汉简的原貌为主。为了能便于欣赏汉简的书法艺术，就对一些简文进行了整条或局部的放大。并在顺序号的右上角做一“*”号标志。简牍的排列是依据简牍的内容实质而表现出的书法变化特征，进行初步分类编排的。其次序是首先选了戍边吏卒用来临摹习字的「小学」类文字。这类简的形制是觚，一般较长，削成三面或者四面柱形，各面均书写。内容是识字、练字的教科书「苍颉篇」、「急就章」。这类简牍文字是相互临摹仿写，虽然工整，但笔划不免羞涩。^③其次，选了采用正隶书写的简牍。从汉代简牍内容中可反映出这样的现象。在汉代时期，戍边文书虽然庞杂，但是那些向下传达的诏书、律令，向上呈报的奏书、帐簿等文件以及需要时常翻阅的药方等文书，是用当时官方通用的正式文字形式「隶书」书写。这些简牍的内容和书写它们的人物虽然不同，但其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表现出了汉代的文人写「隶书」的深厚功底，每一笔都用力均衡、扎实。常常在简末尾字的最后一笔，或竖或捺，往往有意加重拉长，使简中文字的结构重点下移，以表现稳重坚实的内涵。^④最后选的是用「草书」（章草）书写的简牍。主要内容是不需呈报的戍边活动记录的底稿，驻军幕僚所写的奏章草稿，以及那些戍边士吏收到的家书等。这部分简牍文书，在书写时表现的毫无拘束，随手而就，极自然流利，没有一点娇柔造作之感。实质上是敦煌汉简最有特点、最精彩的部分。^⑤

甘肃在汉代武帝始「联络西域，欲断匈奴右臂」^⑥的国策下，经汉王朝历代至魏晋都是重点拓边、

经营的地区。加上甘肃的干燥，少雨风沙多，遗物易被掩埋，这种独具的自然地理环境，使汉代的简牍文书可以较好地保存。近数十年，甘肃境内不断有汉代简牍文书被发现。为了使汉代简牍书法爱好者便于浏览甘肃其他地点出土的简牍文书，我们还选编了附篇以飨读者。

附篇中主要选了以下几个地点出土的简牍文书：

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⑦是「苍颉篇」的第一章，字体带有浓重的篆书意味。内容相同，但有脱文，应是当时在这烽燧上戍边的吏卒临摹练写的。其字虽不甚规范，但有骨力，自有一种韵味。

二、敦煌甜水井，汉代效谷县的一个驿站，县泉置出土的简牍。^⑧该简的内容主要与汉代的邮驿系统相关，同边塞系统相比是有一定的差异。本书选用的是九十年代出土的部分简牍。

三、额济纳旗破城子。汉代居延都尉甲渠侯官治所的文书档案室里发现的诉讼案卷「寇恩册」，^⑨该册是用当时官方通用的正式文字，精心抄录的。

四、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令册」。^⑩该册的主要内容是在西汉时期赐与高寿老人的鸠杖，与使用鸠杖人的待遇的诏书。享用这种待遇的墓主人，在抄录诏书时当然要请第一流的书法家执笔。简牍行文自然是极工整优美。

五、罗布泊附近古楼兰地区出土的部分晋代简牍。^⑪其地理位置在敦煌的西侧。是汉代和晋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屯戍、屯田区。这些简牍文书与敦煌汉简相比较，即有一定的承袭发展关系，又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变化实质上就表现出了时代的特征。

附篇里选的也都是汉代简牍中的精品。但为了避免喧宾夺主，对这些简牍一概不做局部放大处理。

这本《敦煌汉简书法精选》采用正篇用小学（习字帖），正式公文（正隶），公文底稿、家书（章草）三类编排。附篇精选一些河西其他地点出土的简牍文书。采用这种编排方式是希望能给读者以河西地区的简牍文书艺术的整体印象。从汉简的书体中就清楚地反映出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官场之事历代都不敢马虎。从抄转的皇帝诏书，上报的奏章，下传的律令、品约，都用正隶书写，每一笔划都扎实有力，字体扁而庄重，表现出当时士吏们在书写时正襟危坐，谨而慎之，诚惶诚恐之态。而公文底稿、日常纪录和往来的书信，简牍中就表现出在书写时没有什么束缚，虽不甚规范却是心声的自然流淌，心

手的完美结合，字体笔划是龙飞凤舞，信手拈来，极为潇洒。

敦煌汉简，现知纪年最早的简是汉武帝时的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十八年），在楼兰地区发现的年代最近的纪年简，是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公元三四一年），共延续了四百余年。这段时间是中国书法从发展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章草，纵观敦煌汉简，其草书在书写时采用的「简」、「省」、「连」的手段，已有一定的规范。对于章草的起源与发展，古人已有不少论述，如：赵壹《非草书》：「盖秦之末，刑峻罔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草隶，趋急速耳。」梁武帝《草书状》：「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许慎《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张怀瓘《书断》：「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书》，解散隶书，兼书之，汉俗简情渐以行之是也」。近年来，随着祖国文化复兴，许多造诣深厚的学者和书法爱好者，对这一课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今后，我们愿同诸同仁进一步研究探讨这一问题。因水平所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望能给予指正。

编者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

注释

- ① 武威汉墓曾多次出土汉简。见《武威汉简》、《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 ② 《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
- ③ 见本书第十一——十七页简牍照片
- ④ 见本书第二〇——四二页简牍照片
- ⑤ 见本书第四四——六八页简牍照片
- ⑥ 《汉书·匈奴传》
- ⑦ 《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汉简研究文集》）
- ⑧ 《敦煌县泉置遗址出土大量文物》（《甘肃画报》一九九二年一期）
- ⑨ 《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一九七八年一期）
- ⑩ 《王固维：《流沙坠简》

目 录

甘肃汉简书法		(一)
凡例		(八)
正隶书体(一)	简牍及释文	(九)
正隶书体(二)	简牍及释文	(一九)
章草书体	简牍及译文	(四三)
附篇	简牍及译文	(六九)
编后记		(八七)

甘肃汉简书法

我国解放前后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实物史料，也是探讨我国古代书法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甘肃是我国发现汉简最多的省区，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汉简约五万余枚，其中著名的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这批简牍堪称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瑰宝，它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无价之宝，也是书法研究宏大而丰富的宝库。自二十世纪初叶首批敦煌汉简问世以来，随着解放后大量汉简的不断出土，汉简书法的研究日益成为中外书法家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近年来，独具风貌的「简书体」，更为中外书界所瞩目。不少专家、学者均有探讨「简书体」的论著问世，为我国的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养料。本文也拟以甘肃汉简为素材，对汉简书法研究中的某些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求教于研究汉简书法的专家、学者。

一、中国书法艺术是悠悠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绵亘数百代，雄视海内外。汉王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领域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汉代是中国文字变迁十分剧烈的时期，也是书法艺术获得巨大发展的时代。两汉时期，文字和书法的重大变化、发展，及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多样性与个性化，给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汉代简牍是汉代墨迹最丰富的宝库，据此人们在书法领域中，可以脱出「碑」、「帖」的窠臼，冲破魏晋唐人的藩篱，从而开拓出一个新的书艺境界。汉简在书法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法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分析和研究汉简中的各类书体，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性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汉简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基本风格的内涵及书法美学的真谛能有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甘肃汉简，有着与其它简牍不同的特点，故在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价值，也有其独特的表现形态。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甘肃汉简在书体源流、演变研究中的价值。

首先，甘肃汉简以丰富、翔实的简例，清楚地显示了「汉隶」的发展过程。隶书的起源甚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隶书在秦代已普遍流行于民间，在民间得到了不断加工和完美。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修饰，使隶书更臻完美，终于成为汉代的一代书体。我们知道，书法界历来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种，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八分的前身就是古隶，古隶的结体不很方整，字形有相当部分跟篆文还很接近，尚有不少篆文的写法。八分是指结体方整，笔划

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隶书，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汉隶。古隶与八分虽有区别，但两者同属隶书，其区别是非根本性的。古隶与篆书的区别则是带有根本性的区别，因为隶书是「用笔划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的隶书》）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由繁到简、由象形走向不象形、从表形走向表意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发展。所以说「隶变」是汉字形体演变中的一次革命，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古隶起源于秦代，盛行于西汉前期。甘肃发现的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中，以往人们研究汉隶的多，涉及西汉古隶的甚少。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探索，敦煌与居延汉简中不乏西汉古隶的简例，如本书所选编的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即是很好的一例。该觚的字形和用笔虽仍具篆意，无明显波势与挑法，但结体已有较大变化，多用方笔，多取横势，笔划有粗细，行笔较简疾。甘肃汉简中，汉代古隶资料的发掘，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由古隶而八分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汉隶（八分）的成熟期，长期以来，我国书法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康有为曾主张西汉时期「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语出康氏《广艺舟双楫》）其主张在书界流传与影响甚广，以至近人更明确提出「波势之隶至东汉才成熟。」（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隶：《秦汉的书法艺术》》）汉隶（八分）的完全成熟与趋于规范究竟在什么时候，这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敦煌汉简来看，马圈湾汉简中的大量上奏、下达的正式文书中，均为字趋扁形，「蚕头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隶书，如有一件宣帝甘露二年觚的字形尤为明显，这又是隶书成熟于西汉中期可见规整、完善的隶书早在西汉中期业已产生。书法界流行的「西汉晚期」说、「东汉」说，应作重要补充。

其次，敦煌、居延、武威汉简中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发生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慎说：「汉兴有草书。」（《说文解字·叙》）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就是所谓「解散隶体，粗书之。」（唐张怀瓘《书断》引北魏王愔语）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草隶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汉代有「草书」的名称，而无「章草」的称谓。「章草」这一名称，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要属王献之的话。张怀瓘《书断》说：「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藻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这是「章草」一名之首见。关于章草的产生，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汉元帝时史游写《急就章》，作章草。（《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急就章》

条)一种是说汉章帝作章草。(宋陈思《书苑精华》引唐蔡希综《法书论》)一种是说杜度作章草。(唐窦泉《述书赋》)根据上述文献记载,以往书法界不少人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末,成熟于东汉。我们经过对甘肃汉简中的大量汉代草书墨迹的分析、研究,对隶草、章草在汉代的发展过程获得了新的认识。居延汉简中自武帝至元帝年间的简书,有些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这里具体体现了由草隶至章草的发展过程。到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此时章草已形成成为一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的马圈湾汉简与悬泉汉简中发现了比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多得多的草书,大量草书的出现,可称是这两批汉简的一个重要特色。马圈湾汉简中的大量平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奏书底稿,已是成熟的章草。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圈湾汉简中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早已是成熟的章草了。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近人胡小石先生曾说:「隶加波挑,而行笔更加简疾,则为章草,其起与八分殆可同时,也在西汉。」(语见《胡小石文录·书艺略论》)我们认为,胡先生的主张是颇有见地的。他意章草作为一种字体起与八分同时,按我们前文所论证当是西汉中期。汉代的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书法上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由于辗转相摹,早已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及至近代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才显现出原来的面目,使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二、甘肃汉简在书法艺术方面所特有的基本风格,虽因时代不同(如西汉、王莽、东汉)、地点不同(敦煌、居延、武威、甘谷)、字体不同(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用途不同(诏令、奏稿、簿册、书函等)而存在变化、差异,但其基本风格似可以「率意、质朴、粗犷、雄健」八字予以概括。

甘肃汉简书艺上述「八字」特点的形成是有其自身所固有的原因的。甘肃汉简的绝大部分发现于汉代敦煌、居延边塞的城障烽燧遗址,出土文书多系与军事有关的屯戍文书,如诏书、奏书、檄记、簿籍、律令、爰书、符传、契券、邮书、历书、方技书、字书、信函等。这些文书的草拟者、誊写者多系边塞军事防御系统、驻军系统、屯田系统、邮驿系统中的下级吏卒。这些人的身份,据文献记载与汉简资料所示,多系汉代边郡或内郡前来戍边或屯垦的移民。汉简上所出现的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等字体,正是这些大量的下层吏卒,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从实用时效出发,为了书写简便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省易」篆书而创造了隶书;进一步「简省与连笔」而创造了草书。所以说由篆而隶、由隶而草书体演变的真正动力是这批广大的无名书家。所谓程邈作隶书,史游创章草等记述,都是过去封建文人的夸大笔墨,历史上的文字学家、书法家在各种字体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只能起促进与提高的作用。还有

一点必须看到，书法的实用要求、审美要求是互相联系的，书者在书写简便的基础上会尽量要求写得美观些，因为这只会更加有利于实用。因此，群众性的实用要求促使使汉字形体的变化，群众性的审美要求使各种书体发展成为艺术创作。汉简上所显现的隶书、章草的绝妙佳作正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前文已述，由于这些佳作的作者是来自下层的劳动者，他们思想上多创新进取，少墨守成规，故其书风必然是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简古质朴，而少精雕细刻，描头画角的庙堂习气。

甘肃汉简上的各种书作所处的时代与地域，也是形成其特有书风的重要原因。甘肃汉简所处的时代是西汉武帝至东汉建武年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代，它结束了先秦列国的长期纷争，一个版图辽阔、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出现于世界东方。经过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民族的精神、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社会欣欣向荣，到处一派生机。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生产、生活，全力追求事功，朴实而豪爽，远没有为沽名钓誉的虚伪之风和皓首穷经的书呆子习气所腐蚀。广阔的心胸，雄浑、粗犷的气势，使汉代的文化艺术无不体现出天人合一、天人相与、人神不分的精神。在天人关系、人神关系中，崇尚的是人主配天，人征服神。在书法艺术领域也不例外，我们在甘肃汉简中所见到的粗犷、雄健的书风，正是这个气势磅礴的时代精神的具体写照。甘肃汉简所处的地域是汉代的西北边陲，为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的焦点所在，是汉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着力经营之处。武帝时期，长达三十九年的大规模连续不断的反匈奴侵扰的战争，人们团结一致，前仆后继，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终于赢得了战争与和平。当时的敦煌、居延边塞是抗匈斗争的前哨，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长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风宿露餐。他们为民族的利益、国家的统一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这样的客观环境，锻炼了人的勇敢无畏、开拓进取精神，熔铸了人的雄强豪放性格。在汉简上所遗存的粗犷、雄健书风，正是他们总的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

甘肃汉简书艺的「八字」特征，我们还可以从用笔、结体、章法等方面得到印证。汉代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曾指出：「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蔡邕：《九势》）蔡邕第一次提出了书法艺术的力度问题。而书法艺术的力度则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存在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笔墨挥运中产生了书法艺术的骨气与神韵，它是构成中国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汉简的隶书、章草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偏锋、藏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甘肃汉简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奇，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点划内含筋骨，力在字中。简书中有的竖划，畅泻而下，收笔处墨重划粗，婉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

表现出雄浑的笔势美和强健的笔力美。又如武威王杖诏令册的用笔就是中锋取势，侧锋取态；既用方笔，又用圆笔，于方笔中含圆润之趣，于圆笔中得沉雄之貌，圆中有方，方中见圆，堪称杰作。

中国书法艺术是在方块汉字的造型基础上产生的，汉字是书法艺术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书法家必须在此基础上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尤其是在窄小的汉代简牍上书写方块汉字，结体与章法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细察甘肃汉简书法在结体与章法方面颇多创新，其特点可归纳为“三个变换”：即字的重心的变换，字形纵势与横势的变换，字距疏密的变换。但必须提及的一点是这三种变换不是朝一个方向一成不变的。即字的重心一般是左移，但也有右移的；字形一般取横势，有时甚至达到倾斜的程度，但也有取纵势的；字距一般是宽疏，但也有紧密的。通过上述三种变换，使甘肃汉简的书法风格更好地体现了前述的“八字”特征。居延、敦煌汉简的草书那种率意挥毫、繁简相宜、气势雄健的结体美，使人不难想象边疆将士气吞山河的英雄气质。又如武威王杖诏令册，于庄重的整体中，寻求疏密的对比变化。在断句之间，给以空白地，以清其目，既不断其延伸之势，又藉以形成跌宕起伏，达到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效果。特别是在词句终了处和空旷之地，拖以垂露一笔，形成了全册的高潮，令人有笔力千钧的雄强之感。

三、甘肃汉简书法的美学研究，过去书法界在这方面虽有所探讨，但论述尚待深化。我们愿就谈谈肤浅看法，以为抛砖引玉。

书法艺术是线条艺术。从书法呱呱坠地起，就与线条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先民第一个用线条创作汉字图形、表示文字意思的人，就是我国第一位书法家。因为如果没有第一个用线条创作图形、表示文字意思的人，也就没有汉字，没有传统的中华书法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文字的统一，及至篆、隶、楷、草、行五种主要书体的毕至纷呈，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线条艺术就更其明显。汉代是隶书、草书盛行的时代，隶书与草书是更能反映自然与社会现实，高度自由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线条艺术。所以汉代的书法艺术，包括汉简的书法艺术，更应从线条艺术的角度来进行美学探讨。一个方块汉字，由各种不同形态的线条组成。这无数的线条可以千变万化，如方与圆、曲与直、长与短、粗与细、浓与淡、轻与重、缓与速、疏与密、虚与实、奇与正、巧与拙等等，在书法家笔下，这些线条有的重如崩石，有的轻如飞花，有的刚如凿铁，有的捷如闪电，有的柔如嫩芽，千姿百态，各显其妙。我们上文所论述的甘肃汉简书法在用笔、结体、章法上的各种变化，归根结蒂是线条形态与组合的变化。由此可见，由用笔、结体、章法的变化而形成的甘肃汉简书法的“八字”特征，其核心也是线条，所以说线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书法家以自己的作品来反映自然与社会，把书法艺术美与天地山川美、衣冠人物的社会美联系起来的纽带仍是线条，是这无数的线条通贯宇宙赋予了一切创造物。在

书法艺术中，书法家丰富的情感还是通过线条来实现的。书法家笔下千变万化的线条是书法家内心世界表露。书法线条的无穷魅力，曾激动过多少人，振奋了多少人。就是这无数的线条，曾涂写了不少书法杰作，把中国上万年来的书法史描绘得那样有声有色。

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生活在东西汉之交的大文学家和哲学家杨雄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更具体地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这是杨雄「书为心画」命题的进一步发挥。这就是说书法首先有人的心情怀抱的散发，然后才落笔形成书法的线条形式，创作出书法作品来。书法艺术的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是书法艺术家的主观因素的总和——「心」，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结果。杨雄的「书为心画」命题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光辉千秋的经典命题，为后世「意在笔先」的书法理论奠定了基础。中国古典艺术哲学强调艺术表现情感和对人的感化作用，中国书法艺术在自己的实践中充分运用了中国古典艺术哲学提出的情感表现论。书法创作者把自己内心积蓄的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表现出来，书法作品的欣赏者、摹拓者又以自己的种种情感去附丽书法家客观表现出来的情意、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贯穿于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作品与欣赏摹拓者三者之间，贯穿于书法创作与欣赏摹拓的全过程之中。在这方面，近人李泽厚先生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引韩愈语）」，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另一方面，它又是「观于物，是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语）」……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调的伟大生命之歌。」（李泽厚：《略论书法》）我们用「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这一书法美学思想来考察汉简书法，不难发现施展在甘肅汉简上的精妙的隶书与草书，都是自由抒发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出汉简书法作者——广大驻守边疆、无私无畏的下级吏卒的品格与个性，无处不散发着那个辉煌时代的气息，所以它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书法艺术的真谛是抽象美。诉诸于人的视觉器官，表现为静态，展开于空间，流动于时间的书法线条，为什么能抒发情感，造化心灵，其原因就在于书法线条是具象的更是抽象的。书法艺术从一诞生起，就抓住了「抽象」这一艺术的根本原则。书法艺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映是抽象的反映，也就是说它不是具体事物的具体写照，而是从概括事物的具体形态，经过提炼，揭示事物的本质。即是所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在书法家笔下，客观世界的「万殊」都净化为「一相」，即净化在抽象的书法线条及其组合之中，净化在书法作品之中，以此牵动欣赏者的思绪、情感，使之获得隽永的美的享受，这就是

中国书法艺术美的特殊性。书法艺术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质是同人的自由本质相联系的本质，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本质。这种本质既可以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形象的摹拟再现而显示出来，也可以通过各种同人的内在的精神、情感相对应的具体可感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在后一种情况下，书法艺术对现实的反映就更具有了「抽象性」。这也就是作为线条艺术的书法艺术同时又是心灵艺术的哲学基础。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美，在书体演变到了隶书、草书阶段，就体现得更为显著。前文所述甘肃汉简书艺的「八字」特征及其巨大的感人力量即是明证。

甘肃汉简书法艺术美学问题的深入探讨，书法艺术真谛——抽象美的不断揭示，必将对人们进一步研究汉简书法，总结、继承、发扬汉简书艺的精华，推动书法与书法史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徐乐尧 一九九四年五月

凡 例

- 一、凡选用的简牍照片，每面均给一顺序号。
- 二、有局部放大照片的简牍，在其顺序号的右上角标「*」号。
- 三、附注的简牍释文，采用原始释文。
- 四、释文以现行简化字书写，个别字保留繁体字。
- 五、原简文字以外的符号如：「、」「重文号」「△」「替字号」以及「·」、「」等，按原式抄录。
- 六、释文中下列符号分别表示：
☐ 不可辨释之字，每字用一「☐」。
☒ 简牍上下残断处。

正隶书体(一)
简牍及释文